

六合叢書

罗马与耶路撒冷

宋立宏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六合叢書

罗马与耶路撒冷

宋立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与耶路撒冷 / 宋立宏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308-15059-0

I. ①罗… II. ①宋… III. ①罗马帝国—历史 ②耶路撒冷—历史 IV. ①K126 ②K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2678号

罗马与耶路撒冷

宋立宏 著

策 划 周 运

责任编辑 王志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56千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059-0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目录

- 1 自序
- 5 戏说《希腊神话》之伪
- 16 关于纸草
附录：老普林尼论纸草制造
- 35 罗马人民与革命
- 47 哈德良：不倦的旅人
- 66 捉贼的众神：罗马不列颠的咒符
- 85 “阳光下小小的一席之地”：布克哈特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 98 对“罗马化”及罗马帝国文化认同的反思
- 115 “民族历史”范式中的希伯来语圣经
- 129 土匪与英雄之间：书信中的巴尔·科赫巴

- 172 自由与救赎之书：逾越节《哈加达》
- 184 从“匈奴人”到犹太人：政治海报一瞥
- 196 一位以色列汉学家的抉择
- 211 美国犹太文化见闻录
- 235 犹太教有教义吗？——一个观念史反思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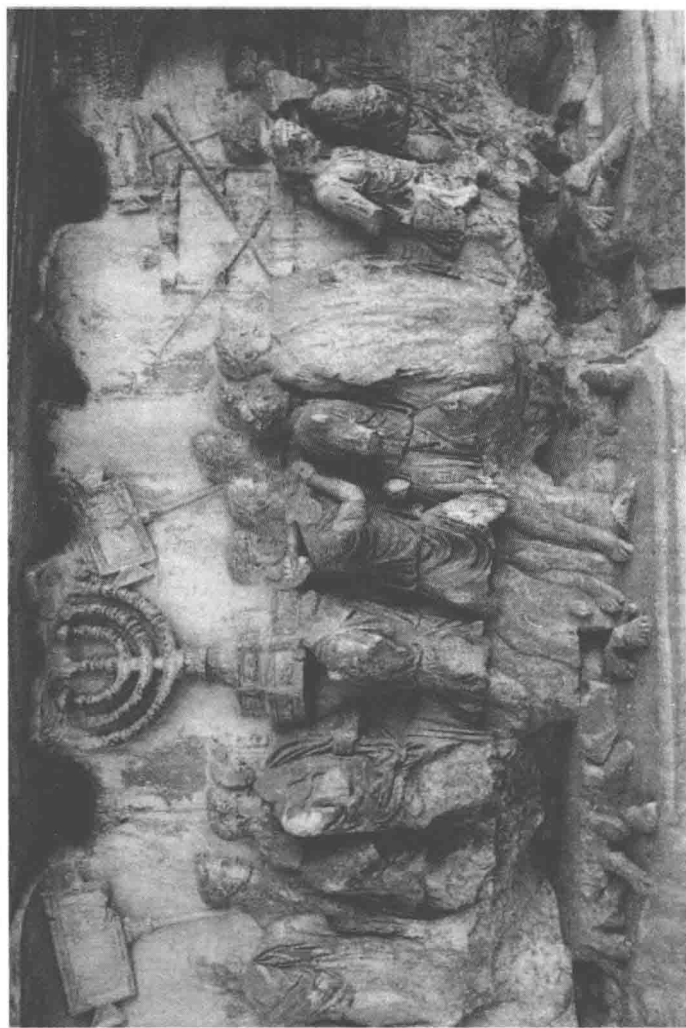
罗马城现存最古老的凯旋拱门，是纪念皇帝提图斯镇压犹太叛乱、占领耶路撒冷的。拱门内的浮雕上，罗马士兵炫耀着从犹太圣殿劫掠来的几件礼器，其中就包括一座七枝烛台。提图斯拱门象征罗马帝国的军威，于犹太教却是污名。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这一污名有增无减：拱门开始带有神的威力已从耶路撒冷转入罗马教会的意味，象征着对犹太人不信耶稣的惩罚。犹太人自然对提图斯拱门心怀芥蒂。许多世纪以来，据说犹太人不能径直从拱门下穿过，须绕道而行，否则便会运交华盖。事实上，古代拉比文献把提图斯称为“邪恶以扫的邪恶后代”，而把罗马帝国叫做以东——这是圣经中以扫的另一个名字。以扫是又名以色列的雅各的孪生哥哥，兄弟俩的争斗始自娘胎，出世后矛盾愈发尖锐。把罗马帝国叫作以东，拉比们显然将罗马人目为势不两立的敌人。罗马帝国衰亡后，他们又把继之而起的基督教国家称作以东。到了19世纪，犹太人竟然青睐起拱门上那座七枝烛台，认为它不仅是考古学意义上最本真的圣殿礼器，更是通往

民族光荣过去的一把钥匙。以色列建国后，它被用作今日以色列国的国徽，这不啻是雅各的凯旋。罗马与耶路撒冷，及其衍生的无尽古今隐喻，是彼此的他者，却又可以像孪生兄弟那样互为镜像。

以上是我编辑这本文集时所想到的。本书选录了过去十余年间写的一些文章，分为上下编。上编七篇与罗马帝国有关，下编七篇则指向犹太教与犹太认同。每篇所写，如今看来，无非是围绕罗马或耶路撒冷的一些向心力或离心力；有时，这两股力是非此即彼的——趋向罗马或以东，就是背离耶路撒冷或雅各，反之亦然。虽然文章之后交代了原刊出处，但我趁此次结集出版，又作了全面修订，个别篇目甚至改头换面。随着新著过眼、读者对象变化，这些增删我认为是必要的，但改动并不针对基本观点，而在于补充新材料，或者让行文尽量平易生动些。

衷心感谢高峰枫、吕大年和周运诸位先生，他们的好意使这本论题遥远的小书能纳入“六合丛书”，让我得以回顾自己过往的脚步。也衷心感谢曾刊发这些文章的主事者，他们的鼓励一直是我前行的动力。

2014年春



罗马提图斯拱门上的浮雕，大理石，240 × 385 厘米，公元 81 年以后。图片承 Steven Fine 教授提供。

戏说《希腊神话》之伪

周作人所译阿波罗多洛斯的《希腊神话》(原名《书藏》),尘封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出版了。在书架上看到它,有如从小报上瞥见一句引自《圣经》的名言,其另类蕴含的诸多耐人寻味之处却又让人噤嘴而止。这可能也是约十年前《卢奇安对话集》面世后回响鲜闻的原因之一。止庵先生对作为译人的周作人与作为文人的周作人遭遇的冷热分明的待遇略有微词。其实转念想想也算正常,毕竟,只有为数寥寥的幸运儿才能像费兹杰罗(Edward Fitzgerald)那样,仅凭一本翻译的《鲁拜集》而占据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书藏》一书的翻译体现出一位学者型翻译家一以贯之的严谨。首先,周氏于版本择善而从。流传至今的《书藏》,后半部缺失严重,但有两个手抄本保存了内容基本一致的摘要(*Epitome*)。《金枝》的作者弗雷泽整理此书时第一次把两个手抄

本的摘要辑录成“节本”，原书所佚部分的内容也包括在内，从而便于读者一览《书藏》全貌。周氏所据底本正是弗雷泽的版本。此外，弗雷泽亲自为此书作注，注中详尽罗列了其他原始文献里提到的相关神话，以和《书藏》对参。周译本不仅保留了许多此类“太可佩服”的原注，还把译者自己在中国民俗学上的创获一并融入，可谓锦上添花。相信这些中西合璧、学养丰厚的译注，对于比较民俗学的研究也有很高参考价值。唯一遗憾的是，译本没有包括底本中细致入微的索引，这是当前学术著作翻译出版中普遍存在的缺憾，这里提出来算是得陇望蜀。

有细心的读者在译者前后两篇引言中发现了问题。写得早的一篇说《书藏》是“西历一世纪的作品”，晚出的一篇又云作者系“公元前一世纪”人。这位读者根据“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他是公元一世纪之人”，而认定后一篇是译者“明显的记忆错误”。^[1]其实这并非周作人之误。

确切说来，阿波罗多洛斯是公元前2世纪的人，西方学界对此没有争论。公元前180年，他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约35岁以后移居雅典，卒于公元前120年至前110年间。居埃及时曾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评注荷马史诗的权威萨莫色雷斯岛人亚里士塔克（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手下工作，到雅典后又师从斯多噶派的巴比伦人第欧根尼（Diogenes of Babylon）。阿波罗多洛斯是古代又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所著希腊编年史虽已失传，但

由于是用三音步抑扬格的诗体写就，朗朗上口，曾经传诵一时。此书还有一个特点：当无从稽考某人生平时，阿氏惯于将其生平中可考的某一事件定为“主期”（prime），再在此基础上前推四十年，当作此人的出生之年。这对后世的年代学影响深远，尽管这种影响弊大于利。《诸神论》是他另一部被广泛征引的著作，今传断片。

9世纪拜占庭的牧首福都思（Photius）最早把《书藏》归于阿氏名下。但这一论断已被近代学者锋利的考证之刀切得粉碎。通过比较《诸神论》与《书藏》，他们发现阿氏在《诸神论》中继承了亚历山大学派的学风，好用理性倾向阐释古代神话，但《书藏》与此大异其趣，它仅仅满足于忠实地复述前人著作，而不顾其中抵牾参差之处。更为决定性的是，此书居然还转引了公元前1世纪与西塞罗同时代的罗马纪年史家卡斯托耳（Castor）的话（卷二章一节三）。所以《书藏》是本道道地地的伪书，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即罗马帝国时期。

所谓“伪书”（pseudepigraphon），既不同于《列王纪》、《历代志》这些虽匿名但不托名的“隐而不托”之作，也有别于作家使用笔名之“托而不伪”。简言之，伪书是“托而隐”之作。屈原名下的《卜居》《渔父》可归属此列。古今中外的伪书不胜枚举，不失为中西文化史上一道诡异怪谲的风景。伪书不像伪画，“托而隐”的动机可以一目了然。考据的利器在语言学等磨刀石

的佑助下固然能识其“伪”，但用来对付“何以隐”则难以再现势如破竹般的凯旋。文艺复兴时，意大利学者瓦拉（Lorenzo Valla）考证出托名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君士坦丁赠礼”实乃9世纪教会的伪造，旨在为教皇统治西欧寻求合理依据。教会作伪动机之昭彰在众多伪书中只属冰山一角。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从不同角度对作伪者的主观意图臆测一二。

草色遥看近却无，站上社会经济思想的高处常常能摆脱置身山中的迷失。在略早于《书藏》成书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批秦火焚书前密藏的经书，围绕它们的真伪问题掀起了众所周知的今古文学派之争。钱穆先生把这一争论置于中国学术流变的大势下评断：

当春秋之季，孔子慨于“是可忍孰不可忍”，而梦见周公，自负后起，遂开诸子先河，为学术之滥觞，是孔子之以“古”争“今”也。逮夫儒、墨攘臂，同言尧、舜，而庄周、韩非目击世变，痛论排抵，其极至于秦人，统学归政，焚诗、书，坑儒士，则又以“今”争“古”也。及乎汉兴，黄、老、申、商，厥势未衰，而公孙、董氏，重提古文，汉武从之，崇古黜今；而今文博士，曲学阿世，自为一闕，别有古学，崛起相抗，是同为以“古”争“今”也。东汉末叶，古学既盛，经籍之焰，势可熏天，会稽

王充，独标异帜，讥切时俗，不蹈陈见，是又以“今”争“古”也。……学术之道，或反而求之于己，或推而寻之于人，“今”“古”之争，遂若循环而无端。彼汉儒恳恳，固亦无逃于此矣。^[2]

如此说来，真伪之辩的实质是对过犹不及的反动。较《书藏》晚出、成书于4世纪末的《奥古斯都史》(*Historia Augusta*)是一部有关公元117到284年间罗马皇帝的传记合集，也是今人了解这段罗马史唯一翔实的原始文献。它有六个作者，但从文体惊人的一致上能断定出自一人之手。其作伪动机历来是古典学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3]有一种现代理论认为，作者的写作年代恰逢异教被基督教打得节节败退、日见衰疲之际，而此书承袭由奈波斯(Nepos)肇始，至塔西佗、苏维托尼乌斯手中光大的拉丁传记传统，足见作者受异教文化浸润之深。作者之所以托名，是想在贬低基督教抬高异教的同时自保。这里透出的消息与陈寅恪先生在挽王国维词序中所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颇有相通之处。另一种理论则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入手。284年，军人戴克里先在近卫军的拥戴下夺取了帝位，彻底抛弃了此前“元首政治”(Principate)最后的一点“秀”：元老院连作为皇帝在公众事务中的回声亦已绝响；罗马宫廷变得像东方宫廷一样浮华奢靡；军队对政权的干预变本加厉。而作者在书

里不时流露出的对元老院的同情、对世袭君主制的反感、对军队干政的厌恶都迫使他必然要“托而隐”。

当然，置身山外未必一定看得真切。《书藏》作者只是一个信而好古之人，他并不相信有关希腊神话的口头传说，而是完全依赖古老、保守的文献。这使他的作品包含了许多与史诗和抒情诗中所述神话有出入的成分，它们被认为属于古典甚或更早的古风 (archaic) 时代。从文体上看，此书叙事平易，不加藻饰，“是希腊神话及英雄传说的一种梗概”，故不及《奥古斯都史》或新发现的《光明之城》^[4]（有意思的是，此书之真伪尚未尘埃落定，已有“去伪存真”的主张了）有诸多可兹发挥之处。善于索隐的人恐怕要失望，但他们知难而上的精神和探索真理的欲望，说不定反而会愈发高涨。

从身后名的角度揣度伪书的作伪动机比较常见，也有人情味。这世上恐怕没有比身后名更徒有虚名的东西了。曲园老人晚年不能忘情于他的“所著书”，还一再以此叮咛后人，就一度让年幼的俞平伯困惑不解，随着年岁增长，他才渐渐明白身后名还是“有点儿实在的”，因为“我们日常所遭逢的一切，远不如期待中的那般切实耳”。^[5]可见身后名之于平淡人生，未尝不是一种慰藉和寄托，毕竟“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作伪者把自己著作伪托在名家名下，以期垂传后世的心情不难理解，《书藏》作者迈上这条通往流芳

百世的终南捷径，亦有可能。不过身后名说到底是自己的名，心甘情愿将自己文章拱手让人者，必淡泊旷达之士。但在希腊化时代以降的古代世界，这种人，若非为时间之沙湮没，实在是很少的，而汲汲于名利乃至投机取巧者倒可拈出不少。

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诗人尤佛里安（Euphorion）在风格技法上摹仿希腊化时代传诵一时的诗人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以及最早把爱情作为史诗主题的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Rhodius），但这种摹仿的频繁和有意识，已到了被论家评为无耻的地步。有意思的是，作为卡利马库斯的学生，阿波罗尼乌斯曾整段整段把老师的作品用自己的风格移植过来，占为己有，而被乃师指责为剽窃。风格精致的罗马戏剧家泰伦斯苛责其粗俗的前辈普劳图斯粗心大意，在改编希腊剧本时竟然漏掉了整整一幕！他没有用“剽窃”一词，因为他夸耀自己比普劳图斯还要忠实于希腊底本。在泰伦斯看来，希腊戏剧家已把话说尽了，自己的戏剧能介于创作和翻译之间就算不错了。不过，当有人批评他在剧本中又加进大量其他剧本的内容，从而“糟蹋”（contaminatio）了希腊底本时，他据理反驳，这个“理”竟是普劳图斯也这么干！这种拼拼凑凑为古典作家广泛采纳，正如墨丘利同为小偷和诗人的保护神所暗示的那样。其流风所及，连巴勒斯坦的犹太史家约瑟夫斯（Josephus）亦不能免俗。约瑟夫斯在定居罗马后开始潜心著述，后人发现他在东抄西抄时，经常不加

分辨地使用内容彼此矛盾的材料，致使同一作品前后不通，甚至还使不同作品在叙述同一事件时互有出入。《书藏》中的不一致问题也出在作者像约瑟夫斯那样缺乏批判精神。学者们通过比较《书藏》与所引原典的残篇，发现作者对原典的迷信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他既没有依据新学说而把原材料重新排比一遍，又没有技痒而对原文踵事增华一番。他太敬畏他所依据的那些权威了。套用一句学界现在讨论热烈的活，这算不算剽窃呢？

“剽窃”（plagiarism）一词在希腊文中意为拐弯抹角、躲躲闪闪，卡利马库斯就是在此意义上批评其学生的。它的“隐蔽性”和拉丁文中的“抢劫、绑架”之意（这解释了泰伦斯避免使用该词的原因）有微妙的区别。正因为这种“隐蔽性”，“剽窃”和“借用”之间的界限不易识别。但这条界限在弥尔顿和黄庭坚的慧眼里清晰可辨：前者振振有词，说“文人间的借用，如借用者不能运用得更好，即为剽窃”；后者在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的同时，又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借此衡量，李维比上述那些古典作家狡黠许多。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其叙事之精湛、辞章之典雅，有口皆碑。他在方法上也远比许多古典作家高明。他不仅在著作中标明自己的材料来源，还经常讨论这些材料的合理性，给人留下言必有据、头头是道的印象；遇到不同材料不尽一致，甚至互相矛盾时，他深谙中庸之道：“如果我们必须选择的话，这些极端之间的中间数目可能最接近真相”（第